

论铁凝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本土化选择——重读《笨花》

On the Localization Choice of Tie Ning's Novel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reading *Clumsy Flower*

李遇春（Li Yuchun）

内容摘要：长篇小说《笨花》是铁凝在 21 世纪初作出中国文学本土化选择的产物。首先，《笨花》讲述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故事，凸显了笨花村人的文化选择、政治选择、宗教选择、人生选择等伦理选择，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其次，《笨花》既不排斥西方现代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传统，又对日本文明予以批判性审视，旨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再次，《笨花》致力于赓续和转化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叙事传统，推动了长篇小说民族形式的当代建构。《笨花》对于当下的中国的新时代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启示性。

关键词：铁凝；《笨花》；本土化；伦理选择；文明选择；文体选择

作者简介：李遇春，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Title: On the Localization Choice of Tie Ning's Novel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reading *Clumsy Flower*

Abstract: *Clumsy Flower*, a novel by Tie Ning, embodies the turn toward literary localization in Chinese novel wri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Firstly, set in the turbulent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eras, the narrative centers on the residents of Clumsy Flower Village and their multifaceted ethical choices—cultural,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personal—projecting the enduring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ly, *Clumsy Flower* does not reject the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meanwhile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Japanese civilization, aiming to construct a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rdly, *Clumsy Flower* is dedicated to continu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represented by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onsequently promoting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ovel's national form. As such, the work offers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ie Ning; *Clumsy Flower*; localization; ethical choice; civilization choice; stylistic choice

Author: Li Yuchu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27,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1053253996@qq.com).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铁凝是一个绕不开的具有界碑性的作家。铁凝多次说过，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你可以不写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但你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直到现在中国所有城市的根基都在农村，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就不真正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朱育颖 50）。显然，《笨花》的创作中融入了铁凝对中国农村与农民的深切理解，她想通过观察笨花村这块热土来思考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内在奥秘。在铁凝的心目中，她的文学创作资源就在“本土”，而不是外国文学对她的“影响”。虽然她承认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影响是空气里的东西”，“资源是泥土里的东西”，两者尽管都不可或缺，然而“本土资源”更能牵动她的艺术神经，所以她始终保持着对孙犁和赵树理写的中国农村小说的热爱。¹不仅如此，铁凝还坚定地“认为我们的本土资源是不可穷尽的”，她“非常珍视”本土资源，且希望自己“在写作中获得的是本土资源、个人感受、世界眼光和母语精髓的融合”（赵艳 铁凝 28）。不难看出，铁凝在《笨花》的创作中，不仅要摆脱从《玫瑰门》到《大浴女》的欧化倾向，而且要超越《无雨之城》的俗化倾向，从而达成民族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本土化境界。这就要求她在创作中必须做到忠实于个人感受和中国经验，将本土资源与外来影响相结合、将世界眼光与母语精髓相融合。

一、民族精神与伦理选择

铁凝曾经坦诚地认为，由于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更迭，中国作家对待中国农村和农民可以不必再单纯采取五四那种启蒙式的“俯视”态度，而是要转为“平视”姿态，这样更能与中国本土民众产生深切的共情。²于是我们发现铁凝在乡土小说创作中虽然也不乏俯视性的启蒙之作，但她从内心深处其实更愿意选择平视性的本土写作方式，这在她多次以《孕妇与牛》作为得意之作，认为它超越了《哦，香雪》的现代性追求叙事，就可以明白作家的个中三昧。确实如此，乡土中国浑然一体的人事与风俗是铁凝内心中永远的精神风景。这在《笨花》中也有着十分精彩和细腻的描绘。在日寇发动侵略战争以前的笨花村，向家、西贝家、甘家、佟家的各色人等都活在乡土中国

¹ 参见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6（2003）：12-13。

² 参见铁凝：《铁凝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260页。

固有的宁静与波动中，他们遵从固有的农耕文明生活形态，但也在慢慢开启渐进性的现代化转型，而在日寇侵入以后，笨花村人遭受了残酷的历史劫难。然而一旦抗战取得胜利，坚强的笨花村人又迅速重建家园，展现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伟力。显然，与《玫瑰门》和《大浴女》中对城市市民和知识精英的人性弱点进行理性解剖不同，《笨花》着力凸显的是乡土中国农民阶层所蕴藏的中华民族精神力量。这一切正如铁凝所言：“我常常在一个城市人身上突然看到农民的影子，虽然他从未在农村呆过，在农民身上我也看到非常大气的，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而是属于中国人的、民族的东西”（赵艳 铁凝 24）。由此可见，铁凝在《笨花》中有着明确的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诉求。

在《笨花》开卷之前，铁凝写了一则题记：“笨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有个村子叫笨花”（《笨花》题记）。这则题记虽然简短质朴，但含义十分丰富，既交代了书名的来历与渊源，也暗示了整部作品立足于本土笨花的民族叙事立场。虽然洋花大约在晚清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从美洲传到中土，它代表着更为先进或现代的生产符号，但笨花的历史无疑更为久远，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与笨花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一种经济作物，千百年来笨花村人就是穿着由笨花织成的紫花汗褂或紫花大袄在这片北中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笨花由此深刻地植入了笨花村人的血肉和灵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笨花就是《笨花》的象征符码，就是笨花村人的精神图腾，它无疑也可以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象征。按照铁凝自己的解说，“笨就是本地的、本土的”，“显得非常本分，含有劳动基础在里面”，而“花”就有“一种轻盈的、飞升的感觉，包含了想象力在里面”，但这种“轻盈”又被“笨”所压制，所以二者的“组合非常奇妙”。“其实人生、日子，一轻一重，都是不可缺少的”，基于此，铁凝才给这部长篇小说取名“笨花”。她最终要抵达的是一种“笨”的境界，即“结实、传统、准确、温润”（铁凝 王干 37），这既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人生境界。而这样一种结实而温润、笨拙又轻盈的人生姿态，其实正是乡土中国几千年来所传承并推崇的中华民族生存境界。铁凝正是在故乡的笨花上发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奥秘，所以笨花才在铁凝的笔下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笨花蕴含着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要义，如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与勇者不惧、安土重迁与抵抗外侮、耕读传家与内在超越，凡此种种，无不彰显了乡土中国民族精神中轻与重的心灵辩证法。

向喜（中和）无疑是《笨花》的头号主人公。“喜”是他从小到大当农民时的名字，“中和”则是他弃农从军后的大名；前者带有强烈的民间乡土气息，后者带有浓厚的传统儒家文化色彩。作为一个旧式军人，向喜喜欢把打仗说成“干活儿”，就像笨花村的农民干农活一样。向喜从小接受私塾

教育，读过四书五经，尤其喜欢孔孟的儒家仁政思想。其实向喜最喜欢的还是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信奉儒家的仁义之道、憧憬儒家的仁政理想，这就使得向喜从小就慢慢形成了儒家文化理想人格。这在他的所作所为中不难窥见，如他虽然家道中落，但依然贫贱不移；入伍后虽然地位日渐尊贵，但可以做到富贵不淫，所娶三房太太（同艾、顺容、施玉蝉）也各自事出有因，符合旧中国的基本人情常理，绝非滥情浪荡之徒；至于他在面对北洋军阀统领的权力压制和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操守或民族气节，更是威武不屈的楷模，真可谓传统中国文化所推崇的大丈夫。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向来以道德伦理文化哲学著称于世，所以中国人在人生选择和政治选择中坚决反对出于个人私欲的生物性自然选择和本能选择，而特别注重道德化的伦理选择。这是“两种本质不同的选择，前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质的选择”（聂珍钊 35），正是道德化的伦理选择给向喜的政治化人生赋予了文化意义。如在湖督王占元下令向喜前去湖北孝感火车站督阵时，向喜拒绝了他，他不能做无情无义的刽子手，亲眼看着自己从家乡带出来的弟兄们被残酷地暗中杀戮。这是王占元对参与宜昌兵变的全体士兵的疯狂报复，假意送他们归乡，而暗中指使人制造人间惨剧。显然，向喜的儒家道德文化理想人格决定了他必须拒绝顶头上司的命令，这是一种道德化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此时的拒绝意味着儒家道德文化伦理选择的胜利。而当面对日寇的劝降投敌时，已经卸甲归隐的向喜选择了从保定避居到兆州县城的粪厂掏粪，直至最终在粪厂为了保护逃亡的同胞而勇敢地选择了与日寇同归于尽。向喜虽然死在不洁之所，但他的人格是高洁乃至高贵的，他的死亡选择正好体现了儒家道德文化理想人格的力量。

其实，向喜在艰难时刻所作出的伦理选择在表面上似乎是一种本能的、半自觉不自觉的选择，实际上是其内心中强大的道德律令使然，是其自幼熟稔的儒家道德伦理文化的人格塑造使然，它之所以表现得如同本能驱动一样自然，正说明了在向喜身上道德意志的强大。显然，《笨花》中的向喜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化身，他就是笨花精神的最佳载体。而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就是要讲究“气节”，无论是孟子所谓面对国内强权时展现的“浩然之气”，还是文天祥面对民族外侮时抒写的“正气歌”，在其背后都有一种“单纯理智”所不可解释的“不拔之信心”，都有一种经历过“慎思明辨工夫”的“确然自信”或“实践理性”，都有一种“以身殉其所信，粉身碎骨亦所不辞，自足以对天地鬼神而无愧”的“心安理得之心理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气节之本质，非理智，亦理智；非德性，亦德性；非信仰，亦信仰。依现代哲学心理学之名词言之，谓为非此单纯之三者所能尽，实兼三者而另成一种理性的信心可也”。因此，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将“气节”的核心概括为“理性”“信心”和“殉道精神”（张君劢 170-171）。毫无疑问，向喜貌似木讷的实诚性格中正隐藏着这种民族气节，这是一种对中华民族的“理

性的信心”和“殉道精神”。惟其如此，向喜才能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具有民族大义的伦理选择。而且向喜的民族气节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亲人们，如他的大太太同艾、长子向文成、次子向文麒和三子向文麟、女儿向取灯、长孙向武备、次孙向有备等人，全都在党内或党外为人民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即使是生性自私、思想有时难免糊涂的二太太顺容，在日寇入侵之后也有了民族觉悟，在通信中表达了对向喜的理解。还有弟弟向桂，倘若不是向喜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风骨，这个贪图名利的商人可能会彻底滑向违背民族大义的历史深渊。事实上，在抗战的民族大义面前，笨花村人除了个别堕落为汉奸者之外，绝大部分都做出了符合民族大义的伦理选择。可见在笨花村有一种闪耀着中华民族风骨的笨花精神，其核心就是民族气节，它深刻地塑造着笨花村人的灵魂，决定着他们在民族大义和人民正义的面前，必须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在笨花村，向喜（中和）是笨花村人中的翘楚和楷模，他在民间文化传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家庭中，向喜是一位父亲，他深刻地影响着子孙和亲人的人生选择和伦理选择；在社会中，向喜是一位乡贤，他得到了笨花村人普遍的敬重。铁凝摆脱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审父冲动或弑父情结，合情合理地重塑出了一个现代乡土中国中令人尊敬而不是被人厌恶的父亲形象。向喜在军阀混战年月和抗日战争时期所做的伦理选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唯一的女儿取灯，这个异地出生的女子像父亲一样始终对笨花村怀抱着无限的深情，最终也在保卫故乡笨花村的民族战争中被日寇残忍地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和父亲向喜相比，取灯不仅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怀，而且接受了现代文化的塑造、尤其是接受了党的革命文化的洗礼，所以她的人生选择更是一种“理性的信心”和“殉道精神”的体现。和取灯相比，小袄子的人生选择就背叛了民族大义，走上了沦为民族罪人的不归路。虽然小袄子也曾做过有益于人民军队的事情，但她由于原生家庭的关系从小缺乏教养，凡事都受制于利益和欲望驱动，故而她最终选择了背叛民族大义，出卖了她内心很崇拜的革命女性取灯。小袄子的人生选择是典型的自然选择和本能性选择，无法升华到符合人民、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伦理选择，所以等待她的只能是历史的耻辱柱。有意味的是，铁凝曾经在早年的中篇小说《棉花垛》里讲述过小袄子的故事，《笨花》里的小袄子的故事可以视为对前者的改写。但《笨花》的改写跳出了《棉花垛》纯粹的人性视角，而上升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层面，让西贝时令做出了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伦理选择。时令真正喜欢的人是取灯，他并没有接受小袄子的性诱惑，而是忍无可忍枪毙了死不改悔的小袄子。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改写视为对人性书写的违背，恰恰相反，如果时令接受了小袄子的性诱惑，那才是对人性的背叛，因为只有与爱情和家国情怀一致的人性才是高贵的。还有时令的弟第二片，西贝二片从小残疾，受人漠视，但他在笨花村遭受日寇蹂躏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民族精

神。为了给姐姐西贝梅阁报仇，残疾人二片化身人肉炸弹向日寇发动袭击，此时的二片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本能选择，而是升华为具有中华民族气节的伦理选择。

二、人类视野与文明选择

铁凝在《笨花》的创作中不仅有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也具备宽阔的人类视野和世界眼光。虽然《笨花》的主要创作意图是为了展现中华民族在战乱年月中坚强不屈、坚韧苦斗的民族精神和伦理选择，但铁凝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把中华民族的伦理选择置放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聚焦和观照，才能最大限度地凸显《笨花》所要展现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精神，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正如铁凝所说：“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能力，它却始终承载着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还有同情心、良知、希冀以及警觉的批判精神”（“文学·梦想·社会责任”21）。这就是铁凝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中国作家的人类视野和人类关怀之所在。在铁凝的世界人类视野中，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融入世界和人类，不断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于是我们看到，《笨花》不仅集中讲述了以笨花村的向家几代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反抗外侮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故事，而且客观地呈现了笨花村人在战乱年月中与现代世界的深刻联系、与人类命运的休戚相关，尤其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对话、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反战主义的冲突与对话，凡此种种，无不在《笨花》这部容量厚重的长篇小说力作中展现了出来。但《笨花》所讲述的毕竟是中国故事，所以铁凝讲述中国故事的人类视野和世界眼光最终还是落实到了中国本土经验和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上，也就是说，《笨花》中的文明选择并没有一味地倒向西方现代性，而是尝试寻求中西文明的冲突、对话与融合的新境界。

显然，铁凝讲述的并非是与世隔绝的笨花村故事，而是将笨花村故事置放在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与对话的历史语境中讲述。《笨花》讲述的中国故事从清末民初延伸至抗战胜利，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正如笨花村人虽然喜爱本土的笨花，但也并不排斥外来的洋花一样，以向喜为代表的笨花村人虽然习惯了本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本土的民族文化传统充满了留恋，但也并不一味地拒绝外来的现代性文化和西方文明资源。即使是在相对守旧的西贝家，虽然老一辈西贝牛的固执守旧心理十分倔强，但在新一代的西贝时令和西贝梅阁那里就已完全从本土守旧心理桎梏中超脱了出来。至于向家几代人中，向喜虽然一辈子坚守儒家本土文化立场，但他开明识大体，并不是那种顽固守旧的保守派，而是以开放的胸襟看待后辈具有现代性伦理的

人生选择。他不仅支持长子向文成读书看报学医，而且对于向文麒、向文麟、向取灯接受现代教育、奔赴革命战线都秉持着鼎力相助、乐观其成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向喜的大太太同艾，这个传统的旧式女子由于早年跟着向喜一起到过许多地方，故而她的思维方式、生活样式和人格气质都与笨花村土生土长的传统女性有了很大的不同，都能体现其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在向喜长期不在的笨花村，同艾就是向喜的精神代言人。比同艾更重要的人物是向家的长子向文成，他逐步成长为笨花村的一代文化贤达。在近现代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向文成始终恪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他像父亲向喜一样宅心仁厚、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深受笨花村人的爱戴和尊重。他还与时俱进，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脉搏同频共振，积极参与到笨花村的土地革命和民族抗战大业中。向文成之所以能在小小的笨花村有如此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世界眼光，主要是因为他通过读书看报自学成才，《笨花》中多次写到向文成读书看报的情景。《申报》是向文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份报纸，他通过阅读《申报》了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诸领域的有益资讯，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文化视界。向文成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判断也是来自于报纸，不过不是来自于《申报》，而是来自于《冀中导报》，可见现代报刊传媒对于塑造向文成的世界人类视野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笨花村人对西方文明与域外世界的接触，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接纳与转化上，还表现在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古老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影响。笨花村所属的兆州县城内修建有兆州神召会福音堂，作为基督教神召会的瑞典牧师，山牧仁和夫人山师娘多年来就住在这座福音堂中坚持传教。他们的传教效果显著，兆州一带四处流传着耶稣基督的故事。笨花村的西贝梅阁在县城上学时接受了基督教影响，她回乡后每每将《圣经》奉为上帝的神谕，因为只有在《圣经》的信仰召唤下，身患肺痨而体弱多病的梅阁才能在笨花村中孤独而坚韧地活下去。最终她不顾家人的阻挠，坚持接受了福音堂的受洗仪式。由于梅阁对基督信仰矢志不渝，所以她敢于无视日本侵略者的枪弹，她主动选择了像山牧师散步一样走向日本侵略者的枪口，她唱着神圣的宗教歌曲被日本侵略者枪杀，而于她而言，这正是走向天国的神圣仪式。诚然，梅阁的选择是宗教选择，但也是广义上的伦理选择，它不同于自然的本能性选择，就像向喜生命中的最后选择一样，同样彰显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毫无疑问，有没有信仰的人是有本质区别的，无论是向喜的儒家信仰、梅阁的基督信仰，还是取灯的革命信仰，他们在信仰驱动下的伦理选择各自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向文成在抗战时期也与山牧师结下了异国情谊。向文成并非向喜那种典型的儒家文化本位论者，他的文化立场基本上属于中西文明对话论，故而他从一开始就不反对梅阁的基督教信仰，而选择了尊重梅阁的宗教人生态度。为了表达自己对梅阁宗教选择的支持，向文成专门排演了短剧《摩西出埃及》给受洗仪式助

兴。必须指出的是，山牧师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国际友人，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国际身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购买医药军需品，而且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并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为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笨花》中的山牧师值得中国人尊敬，他身上纯正的基督教徒品质深刻地影响了笨花村人的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由此可见，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对于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样可以作出独特贡献。¹ 这在民国时期早就被吴雷川等人的著述所深刻地揭示出来。

《笨花》中不仅重点讲述了笨花村人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故事，凸显了笨花村人在中西文明对话中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选择，而且重点讲述了笨花村人的抗日故事，凸显了笨花村人在抗战时期对东亚近代日本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众所周知，近代日本文明的崛起伴随着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泛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或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创伤。据铁凝说，她的一个八路军姑姑在抗战最严酷的1942年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忍地杀害于故乡的棉花地里，这也成了《笨花》中向取灯（取灯姑姑）的原型故事。² 取灯的死，无疑是《笨花》中最令读者扼腕神伤的情节。还有梅阁的死、瞎话的死，乃至向喜的死，都激发了读者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强烈的民族仇恨。中华民族向来热爱和平，但对于故意制造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则必须保持坚定的民族精神底线。然而铁凝深知“‘西方至上’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文学的发育与进步都没有益处”，“在全球化的喧嚣中，我们应该有勇气重振爱与意志，写下有体温的文字”（《铁凝散文》245）。于是我们看到，《笨花》中还重点讲述了年少的向有备与日本侵略者阵营中的反战主义者松山槐多的故事。曾在东京学习美术的槐多原本也有着爱与美的艺术梦想。他在当了八路军的俘虏后开始参加反战组织，为中国抗战出力赎罪。因为取灯的死，槐多画了日本认罪图，乞求得到中国人的原谅。在槐多的心目中和画笔下，笨花村是一个和平的中国乡村形象。他也非常思念日本故乡的亲人和师友，经常独自唱着日本童谣《小小的晚霞》。槐多最后受命上前线，向依旧在负隅顽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喊话，却在思乡歌声中死于日军的枪弹下。八路军则按照一定的规格埋葬了槐多，惟有他留下的与有备在战争年月的跨国情谊，令人唏嘘不已。这意味着，即使是残酷的战争也不可能彻底毁灭人性的美好与崇高，毁灭不了人类的“爱与意志”。铁凝就此在《笨花》中艺术地传达了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拥抱人类世界和平的现代文明理想。

三、民族形式与文体选择

铁凝在《笨花》中尝试的本土化文学实验，不仅牵涉到民族精神与伦理

1 参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7页。

2 参见铁凝：《铁凝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260页。

选择、人类视野与文明选择的问题，还牵涉到民族形式与文体选择问题。应该承认，虽然铁凝在其小说创作道路上多次着力向西方现代派文艺汲取有益的滋养，乃至于有时也会被评论界纳入先锋小说家方阵予以评述，但总体而言，铁凝的小说创作还是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本土经验中，追求中国小说的本土作风和本土风范始终是铁凝心中挥之不去的艺术理想。铁凝曾经坦诚地说：“写作者必须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文学土地，这土地不在多而在养护、经营和开掘，这土地还应拒绝那些促果实速成的化肥膨大剂。今天的金融街并没有埋葬我的文学胡同，因为不论新故事老故事，总有水泥森林之下的老地基做底。在我的文学老地基上，有我的语言之花的根系，有我心中的民族道德谱系，有我对本真的中国民间日常生活的深度惦念”（261）。这段深情告白明确地表达了铁凝扎根中国大地的本土化创作倾向。其中既有精神旨趣上的对民族道德谱系的赓续与发扬，也有文学形式上的对民族日常生活叙事的追寻与迷恋。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谱系中，《红楼梦》无疑是民族日常生活叙事的艺术典范之作。早有论者发现了《笨花》与《红楼梦》之间的叙事关联性，说《笨花》具有《红楼梦》在叙事上所营造的“人间烟火气”和“弥漫感”（陈超 郭宝亮 62）。王干在《笨花》刚发表时也直接对铁凝说过，“这部小说的语言、语调和节奏，都慢下来了，而且你故意用笨得有些拙得方式，用滞重、迟缓的行文风格写作，回避掉了原来的才情飞扬”（铁凝 王干 36）。这种追求“慢”的长篇小说叙事艺术，无疑正是铁凝从《红楼梦》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日常生活叙事经典中承继并发扬的民族形式经验。

《笨花》之于《红楼梦》的艺术借鉴，集中表现在长篇小说的空间化叙事上。《红楼梦》之所以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叙事节奏要慢得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空间化叙事，将传统的情节化或时间化叙事予以消解，让时间消融到空间中，让故事情节淡化到日常生活中。《笨花》也是如此，铁凝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致力于空间化叙事，将原本按照惯例应采用的时间化或情节化叙事予以淡化，转而将清末民初至抗战时期的宏大中国历史叙事借助空间化的日常生活叙事予以表达，这无疑是铁凝的一次大胆的艺术尝试。正如《红楼梦》的主体叙事空间在大观园，《笨花》的主体叙事空间在笨花村，而且和具有广阔的空间辐射力的大观园一样，笨花村也从一个小小的冀中平原村庄辐射到了中国的四面八方，从笨花到保定和北京、到武汉和宜昌，到上海和杭州，甚至牵涉到欧洲和日本，以及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小小的笨花村由此成为了大中国的艺术缩影，而且是人类世界视域中的大中国的缩影。如同曹雪芹醉心于大观园中各种建筑和日常生活空间的精细摹写一样，铁凝也对笨花村的日常生活形态、物理空间分布、房屋建筑特色有着鲜活细腻的描画。如小说开篇即不吝笔墨描绘西贝家的院子，它窄而长，像个胡同，依靠着向家的一面山墙，里面住着以西贝牛（俗称“大粪牛”）为首的一家三代人，这里每天都会上演着西贝家在胡同里一字排开吃饭的日常生活场景，堪

称笨花村的一大奇景。接着就描绘空间感十足的笨花村的黄昏场景。笨花村的黄昏是一台戏、是一个小社会，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的黄昏故事。这里的黄昏从牲口打滚儿开始，这里有鸡蛋换葱的买卖人、有卖烧饼的邻村老人、有卖酥鱼的邻县鱼贩子，还有赖着不走的卖灯油的人，正是他们建立起了笨花村与外部世界的日常生活联系。当然，笨花村的黄昏中不能缺少了“走动儿”每天在村庄中的“走动”（其实是幽会的另一种表达），正是因为有了“走动儿”的“走动”，笨花村的黄昏才彻底变得生动了起来，成了人世间极具人间烟火气的日常生活景观。从《笨花》的开头不难看出，铁凝有意识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铺展开了空间化叙事的大格局，她选择了以一种慢节奏的叙事形态去赓续中国古典日常生活叙事传统。

对于铁凝而言，这种慢节奏的空间化叙事形态，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笨”的美学追求。实际上正如小说的题目《笨花》所暗示的那样，“笨”与“花”相反相成、相得益彰。所谓“笨”，意味着本土、本地、本分、沉稳、结实、大气、朴拙，偏重于形而下的世界；而所谓“花”，意味着灵动、飞升、轻盈、温润，指向了形而上的精神。只有扎根于本土的飞升才能由实抵虚，进而虚实相生，创造艺术的灵境。用铁凝自己的话来说，她在《笨花》中尤为致力于“精神空间用世俗的烟火来表述”（铁凝 王干 38）。所谓精神空间，就是小说的精神世界、形而上的世界，包括人物的精神实在和作者所期望抵达的“虚”的心灵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世俗烟火，也就是习惯上所说的密实的日常生活世界。铁凝在《笨花》中集中努力的方向，就是用密实的、带有世俗烟火的日常生活叙事来刻画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空间和心灵世界，由此做到以实写虚、虚从实来。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红楼梦》无疑正是这样一部以实写虚、虚实相生的长篇杰作，而相对而言，作为《红楼梦》艺术前驱的《金瓶梅》，只因其过于写实，故而无法全面抵达虚实相生的艺术极境。虽然《笨花》在虚实效果上同样存在艺术缺憾，但它在新世纪中国文坛所抵达的艺术境界依然值得欣喜。这部长篇小说中写了三百多种农事和风俗，这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十分鲜见。铁凝之所以将笔触聚焦于如此多的农事和风俗描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想借助充满了世俗烟火气息的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去折射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和心灵世界，比如生活中的意趣、人情中的大美，从中可以窥见民族生存的伟力。笨花人把棉花叫做“花”，他们春天种花，夏天掐花尖、打花杈，处暑摘花，霜降拾花，而秋天的摘花拾花最被笨花人所看重，尤其是村里的男女们在这场劳动中插科打诨、打情骂俏的场景最是令人神往。铁凝就是通过如此密实细腻的农事风俗描绘，让笨花人的精神飞升起来，让笨花村中实实在在的乡村生活升腾起了无限的精神向往。《笨花》由此艺术地处理了民族日常生活叙事中的虚与实的关系，也就是“笨”与“花”的关系。

当然，《笨花》中化实为虚、以实抵虚的艺术方式还有其他类型，并

不止于农事风俗描绘这一种。铁凝曾经饶有兴致地谈到了河北地方戏曲对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其实这部长篇就是《笨花》，铁凝在其中借鉴了中国民间戏曲的化实为虚技巧。《借髢髢》是一曲河北小戏，主要呈现旧时中国乡村里两个妇女为了借不借髢髢而发生的一场极其琐碎的日常生活对话场景。王嫂先是很不情愿借髢髢给小四姐，为此她大段大段地诉说自己不能借的理由，整出戏快结束时王嫂终于说到了那个髢髢，然后又是大段的叙说如何购买这个髢髢并如何珍惜保管它的过程，正在小四姐要放弃时，王嫂终于决定把髢髢借给她，随之又是大段的嘱咐，提醒她如何爱惜保管，如此无止无休、絮絮叨叨，却精彩万分。铁凝从中意识到，“语言和目的之间的距离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如果语言是通向目的之桥，王嫂用层层叠叠的絮叨为自己的目的搭建了一座曲折的长桥，她在这长长的桥上，淋漓尽致地铺陈着她的内心。她那大段的叙述与其说是告诉小四姐不借髢髢是多么有理，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的不借感到不安。话越多，其实不安就越多”（《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181-182）。在《笨花》中也多次出现过女人之间的絮絮叨叨乃至唇枪舌战，其中同艾无端指责儿媳秀芝糟蹋粮食，不懂得勤俭持家的那一出戏剧性场面就深得《借髢髢》的个中三昧。同艾表面上理由充分，而实际上根本站不住脚，在她的教训不断的语言宣泄的背后，恰恰折射了她内心中害怕失去丈夫向喜的焦虑和不安。事实上，《借髢髢》的传统叙事技巧并非其所独有，在《红楼梦》中照样可以见到大量的絮叨和闲聊，正是在庞大的絮叨和闲聊中折射了红楼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暗角。《笨花》中的絮叨体或闲聊体语言叙事风格无疑是鲜明的，这与铁凝此前的几部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之间确实存在着叙事文体取向的差异。由此更可以见出铁凝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民族日常生活叙事传统的赓续与转化。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笨花》创造性地将民族日常生活叙事资源融入到了当代宏大革命叙事框架中，由此使得《笨花》具备了刚柔相济的叙事艺术风格，铁凝也因此进一步从偏于柔婉的女性叙事中超拔了出来。

结语

《笨花》虽然创作于21世纪初，但它对于新时代文学创作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这首先表现为新时代文学创作必须扎根于中国大地、扎根于人民生活，我们必须像《笨花》的创作那样重建文学与中国人民群众生活的血肉联系。铁凝自己也明确说过，在新时代我们要重建“文艺创作的基本伦理”。因为只有“当我们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天地，真切地同吾土吾民在一起，同我们土地上生活着奋斗着经历着喜怒哀乐的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伦理上和情感上，对这个时代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负起责任”（“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49）。毫无疑问，铁凝的《笨花》就是她重建自己

的文学创作伦理的典范之作。相对于《玫瑰门》和《大浴女》中的启蒙式或自审式的知识分子叙事，《笨花》致力于将民族革命战争背景下的革命政治叙事与民族文化叙事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了俯视工农大众的精英视角，转向了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平视视角。这对于铁凝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进步，由此使得《笨花》更为接地气、更能散发出平凡而强烈的人间烟火气。其次表现为新时代文学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这方面铁凝的《笨花》为我们做出了艺术榜样。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11）。同时又指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13）。铁凝在《笨花》中致力于深度挖掘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在中西文明互鉴的世界视野中寻找重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资源，其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吁求，深深地打动着中国读者的心灵。不仅如此，铁凝还在《笨花》的创作中试图重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本土审美风范，她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民族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将其融入当代革命历史叙事模式中，使得《笨花》折射出强烈的中华美学气韵。最后，《笨花》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文学必须坚持“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必须重建新时代文学与中华民族大历史和大时代的关系。《笨花》虽然以日常生活叙事见长，但它并没有利用日常生活叙事去消解宏大革命历史叙事，而是将日常生活的偶然性与革命历史的必然性结合起来，使得两种叙事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这对于当下的新时代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无疑是极其宝贵的艺术启示。

Works Cited

- 陈超、郭宝亮：“‘中国形象’和汉语的欢乐——从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说开去”，《当代作家评论》 5（2006）：62-71。
- [Chen Chao and Guo Baoliang. “The ‘Image of China’ and the Jo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eflections Starting from Tie Ning’s Novel *Clumsy Flower*.”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5 (2006): 62-71.]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
- [Tie Ning. *Clumsy Flower*.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 ：《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
- [—. *Listening with Eyes Full of Tears*. Beijing: Shenghuo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2016.]
- ：“文学·梦想·社会责任——铁凝自述”，《小说评论》1（2004）：17-21。

[—. “Literature·Dream·Social Responsibility: Tie Ning in Her Own Words.” *Fiction Review* 1 (2004): 17-21.]

——： “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 《求是》1（2019）： 45-50。

[—. “The Path Forward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New Era.” *Qiushi* 1 (2019): 45-50.]

——： 《铁凝散文》。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年。

[—. *Selected Prose of Tie Ni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22.]

铁凝、王干：“花非花 人是人 小说是小说——关于《笨花》的对话”， 《南方文坛》3（2006）： 36-38。

[Tie Ning and Wang Gan. “Flowers are not flowers, A character is a character, A Novel Stands Apart: A Dialogue on *Clumsy Flower*.”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3 (2006): 36-38.]

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 《当代作家评论》6（2003）： 10-21。

[Tie Ning and Wang Yao. “Literatur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 Mental Health and Inner True Nobility of Mankind.”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6 (2003): 10-21.]

吴雷川：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Wu Leichua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Xi Jinping. *A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1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1.]

张君劢： 《儒家哲学之复兴》。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Zhang Junmai.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6.]

赵艳、铁凝：“对人类的体贴和爱——铁凝访谈录”， 《小说评论》1（2004）： 22-28。

[Zhao Yan and Tie Ning. “Tender Care and Love for Humanity: An Interview with Tie Ning.” *Fiction Review* 1 (2004): 22-28.]

朱育颖：“精神的田园——铁凝访谈”， 《小说评论》3（2003）： 48-54。

[Zhu Yuying. “Spiritual Homestead: Interview with Tie Ning.” *Fiction Review* 3 (2003): 48-54.]